

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妇女道德观

陈文联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力图以自己的意志改造中国时,深刻反思和检讨了中国传统的性别伦理道德。他们以救亡为出发点,把传统“女德”与国家命运、政治进化、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对甘制和禁锢广大女性的传统性别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提出了富有时代气息、具有男女平等的新型女性道德。这些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传统性别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广度,其表现的锋芒锐气,不仅震惊当时,在今天也颇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20世纪初年;妇女道德观;性别解放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4-0481-06

道德,作为社会用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受着时代、政治、历史、文化、阶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产生于封建专制时代的以“男尊女卑”等级观念为核心的两性伦理,在男权文化的主导下,对男女行为规范划定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标准,代表男性的性别利益。“三从四德”就是男性统治者专门用来束缚妇女的性别道德,以“贞柔卑弱”为要义的“妇德”更是剥夺女性自身发展权利,使广大女性失去道德的主体地位。传统性别道德规范不仅直接规定、制约和影响中国历代女性的发展以及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判,还极大影响着男性的自我发展,乃至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进步。对此,20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在力图以自己的意志改造中国时,并没有忽视女性道德这一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对传统女性道德进行了反思和评判,提出了建立新型女性道德的社会任务。这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传统性别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也反映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下,以柳亚子、丁初我、陈撷芬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渴望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改造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妇女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的强国保种的作用,对桎梏女性解放的传统“女德”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合理评判,进而提出了建立新型女性道德的社会任务。

首先,资产阶级先进分子认为,传统女性道德极大地摧残和压制了广大女性,使女性处于被奴役状态,所以,建立新型女性道德是发达女权、培养“新女界”的需要。传统性别伦理是导致广大女性地位低下、性别歧视的思想根源。关于这一点,先进的中国人早就作了探讨,谭嗣同曾对宋代腐儒所倡导的从一而终等男权道德进行过猛烈的抨击,痛斥这些“警说”使广大女性成为“非人”,她们“不惟关其口,使不能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而只能身受纲常名教的荼毒,俯首贴耳^{[1][66]}。从而揭示出男女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这是很深刻的。到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在探讨妇女解放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传统性别道德与女性地位的关系。他们认为,传统妇德是男性中心社会里男性权力系统控制、统治女性而制定的,它是维护、代表男性利益的,造就了一代代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柔弱女子,使中国女性精神与体质都在向“弱化”的方面发展。因而,欲求女性解放,恢复女子天赋之权,就必须摒

20世纪初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激荡

收稿日期:2006-05-22;修回日期:2006-07-22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2003ZC50)

作者简介:陈文联(1967-),男,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性别思想史研究。

弃代表男性利益的传统妇德。柳亚子对摧残女权的传统“妇德”深恶痛绝,自恨生得太晚,无法执杀“作俑之人”,传其首于五大洲,“以正文明公智之罪”。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女权之萌芽,其摧折践踏也久矣。强权暴肆,公理沦亡,谬种流传,暗无天日;而鰕生狗曲,复鼓吹种种不平等之学说,……束缚禁制灵魂之界,使不得逞,曰扶阳抑阴也,曰夫为妻纲也,曰三从七出也;曰无才是德也。”^{[2](188)} 基此,他号召妇女发愤而起,冲破传统男权社会所设伦理网罗,以光复神圣之女权。署名愤民的一篇文章深刻指出,中国男权社会必有一种特别之道德,为女子当履行之义务,不曰女德,即曰妇道,“而所谓女德、妇道者,不过使女子放弃权利,贬损人格,蜷伏于男子万重压制之下,稍有逾越,即刑戮随之矣”,为此,作者要求清除这种“女子对于男子伪道德之流毒”,以恢复女权^[3]。

其次,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把女性道德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传统女德正是导致国家落后的重要根源之一,所以他们认为,更新传统性别道德是中国致强的重要途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看到,传统女性道德,不仅严重束缚了女性自身发展,而且还累其男性,进而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国家贫穷和落后,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金一在《女界钟》中明确指出,传统“女德”、“女训”,是与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相逆的,它不仅造成广大女性“拘挛成习,窒塞无知”,成为桎梏妇女心灵的枷锁,还使国民养成自私自利、狭隘卑微的人格,成为国家衰弱的重要因素。因此,广大妇女应当以“爱国与救世”为公德,“以炯炯之眸,横览世界”,“以纤纤之手,扶住江山”。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的燕斌,在《社章录要》中就明确把“提倡新女子道德,鼓吹教育”作为其杂志的五大主义。她认为,在男性本位的性别制度下的女性道德,“只算得是个服从主义”,它不仅抑制了女子的人格,还导致了“人种日见衰微”,使广大国民萎靡不振,只知顾惜身家,任凭外人欺辱。由此她疾呼广大女性跳出旧道德,发达女子新道德,“与男性同具国民的资格,尽一分国民的义务”,共担救亡之大任^[4]。

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抓住了时代的主题,论证了变革传统女德和救亡的关系,从而阐明了建立新型女性伦理的必要性,反映了资产阶级妇女道德观的

时代特色和爱国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再次,资产阶级先进分子考察了传统性别道德和政治制度的关系,一致认为,要想推翻封建的政治制度,谋求政治进步,就必须破除封建“女德”。道德作为社会上层意识的一部分,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时代的统治阶级总是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对原来道德加以改造或更新,将其纳入统治阶级的思想范畴。因而,道德就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政治统治的不可缺少之工具。对于道德与政治互为表里的关系,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有了初步认识,有人说:“有民贼独夫者出,利用君臣之名义,以陵压一切,所谓专制政体也。上有专制之帝王,下有专制之户主,父之对于子,夫之对于妇,兄之对于弟,无不以专制行之,更倡为三纲之说,流毒无穷”^[5],明确地把“夫为妻纲”与“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联系起来,指出父权、君权是夫权的基础,这是相当深刻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仅认识到女性道德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还洞察到女性道德改造在政治进步的作用,明确提出:包括女性道德在内的道德观念的改造,必须成为社会全面变革的一部分,必须把政治变革和女性道德的改造结合起来。这种认识在论述女子家庭观念变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丁初我在《女子家庭革命说》^[6]一文开头中就高喊“革命!革命!家庭先革命!”这是因为“综观女权削弱之原因,半由亲族爱情之羁勒,半由家庭礼法社会风俗之侵淫,而莫非由于君主立法之三千年如一日”。正因为家庭伦理与君主专制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欲革命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命家族之命”。这里,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女子家庭伦理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紧密联系,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女子家庭伦理革命视为政治革命的前提,认为家庭革命的目的就是为政治革命服务的;只有通过家庭革命,包括女性在内的广大国民才能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去投身于热烈的政治革命中。这样就从政治角度论述了家庭伦理观念改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从以上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并没有单纯地、孤立地探讨女性道德问题,而是把“女德”看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加以研究,以当时主要社会问题——救亡为出发点,主要探讨了传统“女德”与妇女解放、国家命运、政治进化的关系,这是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女德”观的一大特

色,也是其深刻性的主要表现。这一特点也集中地反映出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所具有的革命性和主动精神。

二

妇女道德既是一种女性行为规范,又是评价女性的一种价值标准。它所涉及的内容很多,既有关于女性道德标准、女性道德行为规范等总体方面,也有诸如女子形体、职业、教育、婚姻等具体方面。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妇女道德观的核心是主张男女平等,它包括男女在道德标准、道德行为规范的平等,也要求男女在身体权、教育权、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平等。

(一) 批判和否定了传统性别道德的双重标准,强烈要求男女两性道德平等权

在古代中国,男性垄断着政治权力和道德权威,两性道德可谓是典型的男权道德,处处打上保护夫权、歧视妇女的烙印。如,男子可以多娶,女子必须守贞,从一而终;男子丧妻能再娶,女子丧夫不能再嫁,甚至为男人殉节;男可依“七出”休弃妻子,妻子不可以背弃丈夫。两重道德法律毒化了中国的大部分男性,也更残酷地桎梏、毒化了全体女性,全社会也染上了虚伪、冷酷、自私的“瘟疫”。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以自由平等学说为武器对维护男权社会的两重道德进行了犀利的抨击,极力要求给予两性平等的道德权。

他们首先是列举大量的事实和现象,深刻地、淋漓尽致地揭露它的种种罪恶,唤起人们对男权道德的痛仇,动员人们起来推倒男权道德。《论道德》、《三纲革命》、《论三从》等文就历数了传统性别伦理道德中的双重标准:男子妇死得再娶,女子夫死不得再嫁,“男子可娶妾,女子无面首之奉”,这是婚配上的不平等;男子“狎妓宿娼,亦自诩风流,不为恶德”,而女子“以不出闺门为知礼,放诞飞扬,即遭诟病,嫌疑形似之地,身可死而谤不可消”,此交际之不平等;“男子杀妻,罪不至死。女子杀夫,则有凌迟之刑;男子停妻再娶,不过笞杖,女子背夫改嫁,罪及缢首”,这是男女在法律上不平等;在道德上有所谓“妇道”、“妇德”来约束妇女,却没有“夫道”、“夫德”来约束男子^[1]。这些不平等,集中地反映出传统性别伦理道

德对女性的钳制与摧残。为此,他们强烈要求清除“女子对于男子伪道德之流毒”,给予女子与男子一样的道德平等权。他们宣称“德无分于男女也”,“德者,人之所得于天”。既然德是天赋之人权,不因男女而相异,因此,广大女性应起来推倒那些“摧残女子之性灵,而俾之不与男齿”的性伦理道德,争取道德平等权。“道德不同者,权力必不平均。……吾辈欲与男子权利平等,必自道德与男子平等始”^[7]。资产阶级先进分子以自由、平等为利器,深刻地反思了传统性别伦理道德对女性的钳制与压迫,强烈要求给予广大女性道德平等权,这对长期禁锢在封建伦理束缚下的中国妇女来说,无疑起到了极大的启蒙和鼓动作用。

(二) 对“柔顺卑弱”的“妇德”观进行了尖锐批判,呼吁广大女性祛除致女人于“弱者”命运的性别阴影,追求生动活泼的幸福人生

为了维系父系家族安定和满足男性心理安宁的需要,进而达到巩固父权制统治目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性别制度在女性伦理道德方面还要求妇女遵从“柔顺卑弱”的道德规范。被誉为“女圣人”的班昭为女人写的《女诫》的第一章就是“卑弱”,其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女诫》的“柔”德说,对后代女教书产生深远的影响,后代女教书说均以此奉为圭臬,其“柔”德说都逃不出《女诫》的藩篱,只是更加琐屑繁杂。正是通过长期男性话语的训诫,“柔”德渗入广大女性的思想和情感之中,成为女性心理结构的一部分。

传统性别制度用“卑弱柔顺”来规范女性,其结果不仅是束缚了女性人格的正常、健全发展,还压抑、挫伤乃至扼杀了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不超越“阴、阳”定位,不祛除致女人于“弱者”命运的性别阴影,广大女性不可能获得精神解放。基于此,20世纪初先进分子对《女诫》及其“柔”德进行了猛烈的批驳。先进女性张昭汉在《班昭论》一文中,以天赋人权说为武器,痛斥《女诫》“是使群女子相率而为自暴自弃也”,不仅制约女性的发展,还累其男性,导致国家贫弱,基此她号召女性自尊自强。宋大华深刻指出,班昭所著的《女孝经》、《女诫》所论的妇德妇言,“以卑弱下人为宗旨”,“无一语不蔽锢女子之见识,桎梏女子之手足”,完全“不适于妇女活泼自由

之秩序”。若当今女性“尚抱守《女诫》、《女孝经》主义”,则“甘为古人之奴隶”,“甘为世俗之奴隶”^[8]。断然否定了传统妇德的合理性。

(三) 对传统“妇容”观进行批判,着力抨击缠足与装饰之害,强调美观要天然生成,提出了建立富有近代气息的新型形体观的要求

在男性为本位的传统性别制度下,属于“四德”范畴的“妇容”,从缠足到穿耳、蓄发、涂脂抹粉等装饰打扮,无不印上男性的“凝视”眼光,打上男性视女性为玩物、为工具的烙印。对于这种“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妇容”观,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先进分子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建立富有近代气息的新型形体观的要求。

(1) 废缠足,倡天足。缠足陋习严重戕害了妇女身心健康。对于这种伤筋折骨的“不仁行为”,20世纪初年先进分子尖锐地指出,缠足是男权社会视女性为玩物的结果:“缠足一事,……其必创于污君独夫民贼丈夫无疑矣!因循一己之私欲,甘冒天下之不韪,乃至波靡四域,流毒千年,父母以此责女,舅姑以此择妇,谬种相袭,恬不知非。”^[9]这种陋习不仅残害妇女自身,使妇女“终身为废人,亦足悲矣”,还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所以,他们大声呼吁必须废除缠足,以保护广大女性身体权。

(2) 摒弃刻意装饰打扮,强调美观天然生成。在男权社会里,男性“视妇女为用物、为玩具,比于园囿之蓄花鸟,奢侈相矜,以多为贵。而妇女亦遂以花鸟粉白黛绿,争妍取怜,一若其义务亦不过图得男子之快乐而已”^[10]。对于这种“图得男子之快乐”的装饰打扮,20世纪初年先进分子深恶痛绝,认为,女子沉溺于穿耳、蓄发、施脂、抹粉、带手镯戒子等等装饰打扮,不是为了体现自身价值,而是为了讨男人喜欢,是“混账的男人拿女子来当做玩弄的器具”,其结果只会加剧女性在“物化”与“性化”中更深地沉沦。据此,他们大声疾呼广大女性跳出旧风气,创造新风气,消除装饰、缠足等“障害”,从而使中国妇女的新道德、新品性逐步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

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告诫广大女性,不要刻意追求那种痛苦万状的变态形体,不要刻意追求以放弃对自己精神世界追求与完善为代价的、仅是满足男人心理和生理欲望的装饰打扮,强调美观要天然生成,装饰不应妨碍卫生、事业、社会进步。显然,这是对传统女性“妇容”观的否定,也标明富有近代气息、具有男女平等性质的新时代女性形体观的生成。

(四) 对传统“妇功”观进行批判,强调女性应

自谋独立,克服对男性的依赖性

在传统男权社会里,女性被禁锢在家里,孝敬公婆、侍养丈夫、养育子女、操劳家务,尽备于“妇功”职务之中。“有事四方之责任,则专以属于男子,循循焉除料量酒浆、纫箴补缀之外,更无天职矣!”^[11]就这样,女性被迫离开外部劳动困守在家庭中依靠男人而生活。长期的依赖生活所带来的恶果既在个人又在社会。就个人而言,经济不自立,必将导致女性独立人格丧失,女权被剥夺,甚至生活艰难。“依人者,奴隶也,非平等之人所宜也。”^[12]所以男子虐待奴役女子天经地义,男子视女子为奴隶为玩物自然之理。就社会而言,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妇女不是“生利之人”而为“分利之人”,这也是构成中国社会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能自食,必食于人;不能自衣,必衣于人。女所耗,男所生,常不足供”,这种状况不改变,“非特女界终古沉埋,男界亦蒙其恶果,华族虽久,生趣索然,淹淹待毙,况于是东西民族竞争剧烈之时代,将何以图存耶?”^[13]有鉴于传统“寄生”观的恶果,20世纪初年先进分子强调广大女性不要“惟恐以脂粉钗环为生活,以仰承洒扫为职务”,应养成独立之性质:“欲中国女界昌明,须自人人有独立性始。其下手工夫,以气节为先,教育、工艺副之。否则,如灭烛夜行,终无头绪”^[14]。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20世纪初年先进分子强调女子不要仅仅局限于家务劳动之中,应走出家庭,到社会自谋职业,保持经济独立,以争自由、复女权。这种“自立”观是对传统“妇功”观的有力否定,在当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实际上,广大先进女性兴女学,办实业,乃至投身反清革命,进而要求女子参政权,要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幕接一幕,一浪高一浪,正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实践和深化。

(五) 猛烈抨击“女子无才便是德”文化观,强烈要求打破传统教育上的性别隔离,给予女性平等的受教育权,以造就新型“女国民”。

在以注重男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封建宗法里,女子教育始终未列入历代学制系统而仅以家庭训导的形式存在于世。教育内容不外乎“三从四德”,实施途径大抵有二:一是日常生活教育,二是传阅女教书。其结果使得女子除顺从之外无思想,舍中馈之外无义务,即便是引为风光的女性文学也多为批风吟月、春怨秋愁之作,而且因其兴盛行与唐宋以后教坊妓院中红裙侑酒、翠香的诗章酬客有关而为传统社会所深戒,乃至明末卫道士以此为口实,炮制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

对于“女子无才是德”的陈腐教条,20世纪初年先进分子不遗余力进行了批驳,尖锐指出此种谬说不过是“使女子沦为男子的奴隶和玩物”。在他们看来,剥夺女子受教育权,是“天下不仁之事”,“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兴,于是男子有学,而女子无学。凡所以待女子者,不过充服役,供玩好而已……蓄之如犬马,视之如花草”,由此质问道:“不使受同等教育,独何心坎?”^[15]“女子无才便是德”谬说的广泛流播,不仅导致广大女性不学无术,以浅陋相夸尚,还致使国民素质下降、人种衰退,正所谓“民品所由败也”、“人种所由弱也”^[16]。因此,欲行男女平权、强国强种,就必须打破传统性别隔离教育,给予女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女学不兴,则平等永无能行之一日”^[17];“我中国今日不欲强则已,欲强则非教育普及不可。图教育普及,非男女学堂并设不可”^[18]。尽管这种论述有拔高之嫌,但也从中看出他们兴办女学的迫切、真诚愿望。

在女子教育价值观念上,20世纪初年先进分子反复强调女子教育的宗旨不在于养成“贤妻良母”,而在于养成与男性一样的“国民”。他们认为,贤妻良母教育观,是那些“号称提倡女权主持清议之老士”之愚论。这些人阳为“兴女学”,实则不为女界谋利益,他们的“兴女学”不是使女子养成国民的资格,而是“为男子造高等之奴隶”,使女子“得贤母良妻之一资格而已”。并断言:“若抱此宗旨以谈女子教育,而教育界之前途,乃为盲风怪雨,皋牢而亭素之矣”^[19]。女子教育的目的从培养贤妻良母转向为养成与男子一样的“女国民”、新女性,清晰地再现了兴女学思想上扬的轨迹。这是女子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六) 抨击和否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片面守节等传统婚姻伦理,强烈要求婚姻自由平等权

在父权制的婚姻制度里,广大女性处于被压抑地位,她们没有婚姻自主权,“父母之命,媒妁之约”成为数千年父权社会婚姻手续的定则,而贞烈、出妻等婚俗更是将广大女性推向痛苦深渊。有感于传统婚姻伦理对女性的钳制和对社会“荼毒”,20世纪初年先进分子以犀利的笔锋对传统婚姻伦理进行了全面深刻地揭露批判。他们指出,在传统婚姻伦理中,一切听命于父母,而作为婚姻双方的青年男女却“无容喙之余地”,这是传统婚俗的最大弊端^[20]。至于传统婚俗中的“媒妁之言”,更是“自由结婚之大蠹贼也”,因此,他们疾呼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宣称:欲平男女之权、夫妇之怨,须“自婚姻自由始

也”。深信只要“力倡婚姻自由,……再济以(女子)学问”,女子定可自立,女权定可恢复,国家也会巩固^{[21] (258)}。

离婚再嫁和贞节观是衡量婚姻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进步知识分子主张“夫妇以情爱,以义合”,“情义既绝,虽生可离”,离婚是女子避免“一生之祸福荣枯恒持其良人为运命”的“自主之道”^[22]。“如果婚姻中道而有丧亡,未逾四十,允许再择再娶”^{[23] (23)}。对离婚再嫁自由认可的思想基础是对片面贞操观的否定。他们尖锐指出,片面贞操观,是男人压制妇女之术;妇人守节,是极不平等、不仁道的行为,极力主张嫠妇是否守节听其自便,并告诫天下父母公姑“勿强妇以守节”,天下青年女子“慎勿勉强守节”^[24]。“男可再嫁,女可再醮”的婚姻观充分显示了向传统挑战的力度。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先进分子以自由平观念为武器,深刻反思和检讨了中国传统的性别伦理道德,尤其对钳制和禁锢广大女性的“妇德”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力图通过建立新型性别伦理的途径,打破传统性别道德对广大女性的种种束缚,解放妇女,培养新型国民,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这也是一种启蒙,而且由于性别伦理道德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而这种启蒙就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构成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

20世纪初期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即近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转变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更新,而且还包括社会的进化和文化发展。其中,实现文化心理状态(如道德情操、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的近代化是最复杂、最艰巨、最深刻的革命。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性别伦理道德观念的更新也是人的近代化、社会近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身处近代化进程中的人如果没有经历人格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即人自身没有从思想道德方面经历一个向近代化的转变,人的近代化、社会的进步也将是畸形的、片面的。有鉴于此,20世纪初年的先进分子以自由、平等为利器,对束缚广大女性发展的传统性别伦理道德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和大胆否定,他们力图通过建立富有时代气息、具有性别平等的新型女性道德,来打破陈腐的传统女性道德对女性的束缚,促进女性解放,培养新型国民,振作民族精神。这一切对于唤醒广大女性解放意识,冲破狭隘的生活空间,追求人生幸福与社会的

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实际上,以秋瑾、何香凝等一大批先进女性群体,纷纷冲破封建伦理束缚,走出家庭,冲向社会,积极投身于妇女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事业之中,就是这一认识的实践和深化。

当然,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妇女道德观也存在某弱点与偏颇。突出地表现在资产阶级先进分子过分强调了性别伦理道德的政治意义,而忽视了道德自身的特性和发展规律。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在探讨女性道德时,不是从女性道德这一特定的文化形态入手,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去分析女性道德问题,强调了女性道德的政治意义,而对其自身的特性认识不足,因而,在改造和更新传统性别道德的方法上,他们显得过于急躁,更多的是主张用行政手段强行革除旧有道德。这虽然反映了资产阶级改造传统性别伦理的决心,但却成效甚微,根本无法完成建立新型女性道德的任务。这就是资产阶级女性道德观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 [1] 谭嗣同.仁学[A].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1.66.
- [2] 柳亚子.女界钟.后叙[A].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年)[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3] 愤民.论道德[J].克复学报,1911,(2,3).
- [4] 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J].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2,3,4).
- [5] 稚.论理[J].女学生,1905,(2).
- [6]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J].女子世界,1904,(7).
- [7] 巾侠.女德论[J].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1).
- [8] 宋大华.读《女孝经》《女诫》[J].女子世界,1906,(4,5).
- [9] 厦门天足会约章叙论[N].万国公报,1904-10-20.
- [10] 范祎.论中国薄待妇女之制度[N].万国公报,1905-03-16.
- [11] 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J].女子世界,1904,(3).
- [12] 张肩任.女子自治说[J].女报,1909,(2).
- [13] 蔡湘.论中国今日亟普设手工女学校及传习所[J].女子世界,1907(6).
- [14] 林士英.论女子当具独立性质[J].留学女学生会杂志,1911,(1).
- [15] 竹庄.广兴女学议[J].四川学报,1907,(6).
- [16] 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N].警钟日报,1904-4-23.
- [17] 张肩任.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J].女子世界,1904,(2).
- [18] 师竹.论女学之关系[J].云南,1905,(16).
- [19] 师竹.论女界之前途[J].女子世界,1905,(1).
- [20] 履夷.婚姻改良论[J].留日女学生会杂志,1911,(1).
- [21] 江毓真.论婚姻自由的关系[A].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22] 江亢虎.忠告女同胞[N].民立报,1911-06-12.
- [23] 何大谬.女界泪[M].北京:京都书局,1908.
- [24] 谢震.论可怜之节妇宜立保节会并父兄强青年妇女守节之非计[J].女报,1909(2).

On the Chinese Bourgeois Women's value of Morali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HEN Wenli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the bourgeois pioneers were fighting for the course of reforming China with their own thoughts, they deeply examined the traditional morality of sexuali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urviving China, they connect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women's morality with the fate of China, political improvement and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The bourgeois pioneers sharply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sexual morality of that shackling women. They advocated the ideas of forming a new concept of women's morality, which is rich in the flavor of times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se thoughts reflected bourgeois thinkers' deep and wide examination in traditional sexual culture. The dashing spirit, which was showed by them, not only shocked then society but also enlighten people's thinking today.

Key words: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alue of women's moral; sexual liberation

[编辑:颜关明]